

李光耀眼中的天下大势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讲师)

当代国际关系正经历着一次历史性的变迁,身在其中的人们虽有察觉但却难以清晰地感知其中的脉搏,身在此山中也就难识庐山真面目。变革的时代需要一流的政治家把舵历史的航向,富有智慧的政治家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无疑是世界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新加坡在他的治理之下不仅创造了发展的奇迹,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而且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学习与模仿的对象,李光耀本人也已经成为新加坡的“名片”。在一个变革与纷乱的时代,李光耀对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分析尤为珍贵,《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和《李光耀对话录》展现了李光耀对天下大势的真知灼见。

一 中国、美国及其均势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然其也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力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策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李光耀认为中美关系处于构建之中,美国不应该将中国视为对手或者敌人,而中国应该从历史的悲情中走出来,稳定的中美关系关乎世界人民的福祉。

中美关系之所以重要在于中国能够崛起,而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能否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对于这样的问题,从不同的立场或者理论预设出发,会有不同的预期。李光耀本

人一直强调对理论不感兴趣,他愿意选择可行的方法,并做好替代性的方案。李光耀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衰落论只是一种假说,21 世纪美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优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超越的。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李光耀一直是美国政府的“座上宾”,也是中国政治家的老朋友,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愿意倾听李光耀的意见,奥巴马 2008 年访华之前曾到新加坡与李光耀会晤一个小时。李光耀是小国的大政治家,新加坡虽然只是一个城市国家,但是李光耀却坚持认为新加坡必须是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从创新能力、政府管理水平等方面来看,新加坡并不是小国。事实上,新加坡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大国政治的权力结构之中,新加坡不仅是亚洲的金融中心,也是亚洲多边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的承办地。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东亚乃至世界的权力结构,而周边国家以及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未来还怀有不小的疑虑,当 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李光耀就认为沉睡的中国即将醒来。李光耀以及新加坡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原因在于,新加坡必须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车。

李光耀摇摆于中美之间,或者说在两国之间左右逢源,因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战略家,他的战略意图是推动中美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均势。李光耀希望美国能够关注东亚,他给美国的建议是“一定不能过多地把精力放在中东地区,不能过度关注伊拉克、伊朗、以色列和石油,以至于让其他国家乘虚而入并接管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①。另外,李光耀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而美国也未必能够一直参与东亚事务,所以东亚地区需要“内在”的均势格局,他成功地将印度的目光吸引到东南亚,因为未来二三十年中,只有印度有可能与中国匹敌。

中美关系不仅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也是两个文明之间的互动。李光耀认为,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一样,中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中美之间的均势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中国 13 亿人口的大市场也对西方形成了制衡。李光耀反对美国像“班主任”一样对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指指点点,“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就是增强它和世界的贸易关系与投资关系,然后它的繁荣将更多地取决于它和贸易大国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协调性,而且广泛的联系将影响和改变其文化价

^① [新]李光耀口述、[美]罗伯特·D. 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 页。

价值观和道德标准”^①。李光耀希望中美之间的“磨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防止出现激烈的震荡。

作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李光耀并没有选择倒向中国或者美国,而是保持了一种“直升机”的思维,既能远观大势走向,又能洞察幽微。中美之间的均势格局能否实现,关键还在于两国的活力,李光耀也为这两个国家分别提出了建议。对中国而言,法治国家的建设尤为重要,“到2035年,它将建立一套全面的法典,并且制定一个稳定的法律体系,加上清廉的行政法则,事实上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如果地方政府犯了错误,就可以根据相应的法律程序让其进行解释或加以惩戒,用这种方法约束地方政府,比之前惯常采用的无休止的会议有效得多”^②。这也是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经验之谈;而对于美国,李光耀则希望美国的政治家能够从对选票的崇拜中解脱出来,“美国的领导人必须知道如何领导国家,知道什么符合美国的真正利益并愿意为之努力,即便无法再次当选也在所不惜,而不应该一味受制于民众情绪”^③。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中国也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重塑自我。李光耀已经看到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来塑造的,美国不能将“接触”和“遏制”这两种不同的对华政策混杂在一起。中国的崛起也是亚洲崛起的信号,美国需要适应并“消化”亚洲崛起带来的冲击。

二 亚洲崛起以及恐怖主义阴影

李光耀说:“21世纪,人们将见证亚洲恢复其世界地位。”^④虽然他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亚洲实现均势,但他还是乐于见到亚洲的崛起。在过去几百年中,亚洲只是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或者“殖民主义的概念”而存在,但是现在亚洲的经济与战略地位已经呈现出来,人们可以期待一个互动更加紧密、经济更加繁荣的亚洲。

除了中国之外,李光耀还将目光投向了印度。与西方对印度民主制度的赞扬论调不同,李光耀认为印度的官僚制度窒息了国家的活力。民主制度不能成为惰性的借口与托词,李光耀曾经建议英迪拉·甘地采取更加有力的管理方式推动印度改革,比如打破种姓制度对阶层流动的限制,然而时至今日,印度依然

① [新]李光耀口述、[美]罗伯特·D. 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30页。

④ 同上书,第19页。

如此。对于印度的未来,李光耀认为除非印度能够解决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尤其是政府的效率问题,否则印度未来的前景并不乐观。印度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政府却像印度的神牛一样缓步前行,就像李光耀所体察到的:“一个民族的历史不是由一两次选举决定的。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过程,不取决于某些任务,而取决于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①亚洲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毫无疑问,东亚地区(尤其是东亚“四小龙”)已经成为发展的典范。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我认为这是我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最有价值的事情。”^②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的成功已经成为了“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但新加坡却提供了城市治理的典范,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城市能够达到新加坡的治理水平,那这个国家就没有理由不崛起。每年都有不少国家的官员前往新加坡观摩与学习。李光耀在20世纪60年代就接受了市场经济与跨国资本,彼时冷战气氛浓厚,很多人将跨国资本视为“剥削”工具,而李光耀则依靠跨国资本实现了新加坡的工业化。利用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几乎成为“东亚奇迹”的一种发展轨迹。中国在经历30年快速增长之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越南、缅甸等国家转移,东亚国家不断地重演新加坡当年的历史经历。

东亚的成功也是美国重返东亚的重要原因,奥巴马政府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试图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市场。在此之前,李光耀就提醒美国,“没有贸易协定,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以及东盟国家将被中国经济吸引过去,应该避免出现这种结果”^③。现在看到的是东亚地缘经济的重塑,经济增长依然是东亚的核心议题。在亚洲的西端,恐怖主义或者内战则愈演愈烈。也许人们不会想到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处于伊斯兰世界包围之中。正因为如此,李光耀对族群、宗教冲突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当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时,李光耀赞成其关于伊斯兰教的论述。

对于恐怖主义,李光耀认为这是全球化的结果,一些国家没有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反而被边缘化,美国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其也就变成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憎恶的对象。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中东产油国获益颇丰,而沙特从此之后

① [新]李光耀口述、[美]罗伯特·D. 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② 同上书,第158页。

③ 同上书,第51页。

开始大规模资助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宣扬瓦哈比教派的教义,而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则从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中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个目标就是控制中东产油国,建立类似塔利班式的政权。

恐怖主义表面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则是温和的穆斯林与极端主义者之间的较量,李光耀建议:“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同盟抵制伊斯兰极端分子宣扬的仇恨思想。”^①只有让更多的穆斯林分享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果实,才能与恐怖主义组织争夺人心。而现在恐怖主义组织只能制造混乱或者恐惧,其技术和组织水平并不能推翻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李光耀曾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治国能力大为怀疑:一个有着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居然完全没有现代国家的样子,甚至向部落社会倒退。

亚洲崛起的因素是复杂的,但是各国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亚洲实现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李光耀将新加坡这样一个没有国家传统的城市国家打造为世界“核心国家”,其治国能力使之跻身于“亚洲先知”的行列。

三 李光耀的政治哲学

美国记者汤姆·普雷特在与李光耀畅谈之后得出结论:“他不偏向任何的执政模式,只欣赏能够有效治国的模式。”^②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李光耀本人也认为:“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者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总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③的确,李光耀不会去搞理论,毋宁说他本身就是理论家研究的对象。

李光耀纵论天下大势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精英主义观念,一个国家的兴衰系于人才,尤其是在政府任职的那一群人。新加坡的公务员队伍大抵是世界上最有效率、最廉洁,当然也是最高薪的,“高薪养廉”一度被认为是新加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秘诀在于以法治保持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吸引和选拔最具有能力的人加入政府。李光耀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并不热心,甚至认为这种平等主义的选举制度会造成政治功能失调,因为政治家们会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讨好选民,做一些“政治正确”却毫无价值的事情,为了获得选票而

① [新]李光耀口述、[美]罗伯特·D. 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② [美]汤姆·普雷特:《李光耀对话录》,张立德译,现代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③ [新]李光耀口述、[美]罗伯特·D. 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给选民画下大饼,结果造成福利过度。李光耀认为,美国的一大危机就是“欧洲化”,过多的福利压制了人们的创新热情,同时养了一群懒汉,竞争力自然就下降了。

李光耀并不纠缠于概念或者意识形态,而是一切以结果为导向,实施最可行的方案,目标是为大多数的人谋取最大的利益和福祉。当然其前提是李光耀知道新加坡人最需要什么东西,同时知道如何获得这些东西,正因如此,很多评论家将李光耀称为“软威权主义者”,但他并不在意,因为在李光耀看来,能够评判他的只有新加坡人,而不是理论家。

很难用一两个标签来“澄清”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和政治哲学,他的施政理念是功利主义的、是以绩效为目标的。他是马基雅维利的崇拜者,在新加坡厉行法治,比如对贩毒者执行死刑,此举受到人权组织的诟病,但是李光耀则认为,如果不对这些人严厉惩罚将会有更多的人受害。李光耀承认,二战期间日本人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让他见识到了什么是权力,所以李光耀身上有狮子一样的威严与冷酷。李光耀对秩序有着超乎寻常的钟爱,普雷特认为,在这一点上,李光耀简直就是升级版的霍布斯,换句话说李光耀也力图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利维坦式的政府,将公民自由限定在秩序的框架下。

如果仅仅是对权力的痴迷,那李光耀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篡权者”了,而他受到了多数新加坡人的敬重,因为他还有一种理想主义,就是建立一个良治的“乌托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光耀的政治哲学:有儒家传统思想的理想主义者通过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实现霍布斯式的秩序以及边沁所希望的最大“功利”。